

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

——兼订正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

莫世祥

读刘丽同志所写《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一文（《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颇有同感。惟惜其论证未能完全揭示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关系的来龙去脉，谨补充和订正如下。

一、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历史联系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流亡海外。为了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斗争，他们把建立海上秘密交通线的重任寄托在海员身上。1914年，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人赵植芝、区玉、李拔南等在香港组织联义社，购运军械，转递密件，接应内地的革命活动。从这年下半年到1916年上半年，中华革命党先后在香港14艘邮轮上建立分部，委任分部长。据说“海员全体加入中华革命党，运输困难，由是解决”^①。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原中华革命党党员都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20年11月，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联义社迁广州，旋奉孙中山之命，改为联义总社，成为国民党联络海员、华侨的“海外交通部”。这时，香港海员筹措组织全港海员工会，孙中山欣然命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该会分别在广东军政府和香港政府登记注册，于1921年2月18日正式成

^① 《香港联义社革命史略》、《中华革命党委任人员姓名录》，《革命文献》第45辑。

立^①。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二、国民党内部对待香港海员大罢工 的不同态度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之初，领导成员均为国民党人。该会倡议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国民党员谢英伯、陈炳生等组织罢工总办事处，具体负责罢工的各项工。广东国民党政府也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支持罢工。罢工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然而，当时的国民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它在领导海员罢工的时候，不能不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与妥协的两重性。

(1) 海员工会中的党人分歧。海员罢工是海员工会中下层国民党员推动和鞭策主持工会的上层国民党员的结果。据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报道，陈炳生等工会领导人因受工人群众起质问，被迫于1922年1月12日上午9时向船东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应允加薪，否则一律罢工。可是，当天中午，工人们就坚决要求立即举行罢工。“激烈派会员大为鼓噪”：“若不先行罢工，即念（廿）四个月亦无答复也。言时极为愤怒，竟有将座上局（焗）盞茶杯掷地者。主席（陈炳生）与办事人见事势如此，而工人一唱百和，究非言语可能和平解决，而罢工之事遂成矣。”^②在“激烈派会员”强烈要求下，罢工提前在当天下午5时举行。可是第二天，由于香港华民政务司通告愿意调处劳资关系，陈炳生、翟汉奇等工会领导人又通知工人于该月16日以前回船复工。海员工人斥责这一叛卖行径“显系二、三办事人所为，事非公决，势难承认。”^③虽然当时的报刊没有标明抵制工会领导

①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

② 《民国日报》1922年1月22日。

③ 《羊城报》1922年1月16日，转引自章洪：《香港海员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人妥协倾向的“激烈派会员”的名字，罢工期间工会领导班子变动一事却告诉人们：被海员工人推选上工会领导岗位的苏兆征和林伟民，就是“激烈派会员”的先进代表。苏、林、陈、翟同为国民党员，原有地位的差异却使他们在维护海员利益的问题上出现激烈与妥协的冲突。这一冲突体现着国民党领导早期劳工运动的两重性，同时又导致当事者双方数年后分别对峙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营垒之中，刘丽认为国民党对海员罢工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苏、林等下层国民党员身上，这无意中忽视了陈、翟等原工会主持者所体现的国民党上层领导的作用。事实上，陈炳生在海员罢工前和罢工后不久都担任海员工会会长。罢工后期虽因索妻案被羁押在狱，但不到三个月就由孙中山特赦，重新出任海员工会会长。这显然得助于国民党上层的青睐和在海员中的势力。如实承认国民党对海员罢工的领导同时体现在苏、林、陈、翟等人身上，有助于认清国民党领导早期劳工运动的两重性。

(2) 国民党上层领导对罢工的支持和戒虑。海员罢工前后，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处于鼎盛时期。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正式政府”对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劳工运动采取宽容和扶助的开明态度。从1921年5月“正式政府”成立到1922年1月海员罢工不久，广州已有80多个行业先后成立工会。其中27个行业工会分别举行过要求加薪的罢工，有21个行业工会的要求得到圆满解决^①，香港海员罢工后，正在桂林整军北伐的孙中山急电国民党员马超俊“前往慰问，并力于协助。以是海员益为奋兴，坚持罢工，不为所屈”^②。

然而，国民党上层领导扶助劳工运动，既出自同情恻隐之心，又寓有疏导防范之意。1921年初，戴季陶在《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理由书》中强调，应当在鼓励实业的同时，以法律确保工人的某些权益。“否则，文化愈进步，产业愈发达，而社会阶级之

^① 《民国日报》副刊，1922年3月14日。

^②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

悬隔愈甚，多数人之地位愈趋于卑下，反动之来亦愈速而愈大。今兹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皆将陷于被革命之悲境。”^①既然扶助劳工的目的，在于避免“革命人物”“被革命”，那么一旦劳工运动危及“今兹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国民党支持劳工运动的乐章也就会出现令人沮丧的低调。

当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正致力于护法北伐。他们担心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当局公开冲突，会招致英帝国主义等列强的武装干涉，从而殃及北伐大业。因此，他们在对外宣传中往往洗脱与海员罢工的关系，不敢承认国民党在罢工中的领导作用。1922年2月，香港当局对广州国民党政府采取报复行动，禁止将粮食、煤炭、五金转运广州。广州政府为之震动。外交部次长伍朝枢急忙致函英国领事，声明：“海员罢工，是工人自身利益问题，与粤政府绝无关系。”^②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剖白：广州官方采取不干预罢工的原则，但可能有借款供给工人使用^③。个别国民党要员的神经还衰弱到如此地步：迟迟不敢批准罢工海员在广州义务筑路，“恐外人因此牵入国际问题。”^④事后，孙中山也坦率地申明：他只注重北伐，没有参与发动海员罢工，更无意与英国冲突。他说：“当罢工事起时，余在广西之桂林，……余初不知有罢工事。直至吾人军用品因交通断绝不能达梧州（经此往桂林）时，余始知之。至余对罢工者之感想，苟彼等之目的为经济的，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罢工，其后虽牵政治，原始时实为经济的也，但谓余赞助罢工，以期损害英国利益，余绝对不能承认。惟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⑤

至于当时陈炯明之所以热心主持罢工调停事务，很大程度是藉以抬高身价，增加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易的筹码。英国殖民者也把早日平息罢工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并以巨款引诱陈炯明

① 见高语罕：《广州纪游》，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

②④ 《民国日报》1922年2月23、17日。

③ 转引自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

⑤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35页。

颠覆孙中山的护法政权。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责孙中山“乔装成劳工向导”，认为对海员罢工“进行有效抗衡的唯一希望”，“存在于陈炯明将军的政府的固有共同意识之中。该政府对这一运动完全出自同情，并以明智圆通的态度对待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香港汇丰银行同意只要陈炯明发动叛乱，就向他提供50万英镑的援助^①。陈炯明秉承香港当局的旨意，催劝罢工海员降低加薪要求，早日结束罢工。2月下旬，港督致电陈炯明，答应将海员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这仍然低于海员要求增薪百分之三、四十的标准。陈炯明却在同月26日向海员演说，敦劝他们接受港督条件，3天内开船复工^②。海员们不为所动，在2月底联合香港各行业工人进入总同盟罢工，直到3月8日才胜利结束罢工。

由于阶级、党派和集团利益的差异，国民党上层人物在支持和领导海员罢工的时候，无不首先顾全本阶级、本政党乃至本集团的私利，无不有意掩盖罢工本身所体现的反对外国殖民者剥削压迫的光彩。孙中山对香港报刊指控他“唆使”罢工的辩白，广东政府宣布与罢工“无关”的声明，陈炯明“调停”罢工的表演，这一切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都给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罢工的关系蒙上幽深的阴影。

三、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

1922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目睹了罢工初期国民党人竞相支持工人罢工的热烈场面。半年后，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执委会的报告中依然为之赞叹不已：“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

① 奥勃特：《银行家和外交家在中国（1917—1925）》D.R. Allbert：Bankers and diplomats in China，1917—1925：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1981。）

② 《民国日报》1922年2月28日。

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所领导。”马林还批评中共广东党组织“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他举例证实说：“今年正月十五日联合举行示威以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有两千工人参加。但是，很奇怪，共产主义小组对这次活动却置身事外。”^①马林的报告断言广东党组织置身海员罢工之外，对此，海内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迄今尚无异议，仍然以为足资证信。

这是亟需订正的有关中共党史的第一份失实的报告。

先看1月15日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活动的真相。据《民国日报》报道，在这天，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互助社和马克思经济学会联合举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会。到会工人4,000余人，其中罢工海员2,000余人。国民党员谢英伯担任大会主席。中共党员林伯渠和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陈公博、谭鸣谦（即谭平山）、谭植棠等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们号召罢工工人发扬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二人宁死不屈的“非妥协论”精神，“非贯彻阶级斗争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我们只有联合无产阶级，举行世界大革命，根本推翻资本阶级，以贯彻我们的目的”^②。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可见中共广东党组织（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中共广东支部三位负责人也都在纪念会上公开向海员工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怎能说得上“置身事外”呢？

大量的史料证明，广东的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海员罢工之后，积极进行接待和宣传工作，鼓励海员坚持斗争，指明工人阶级最终解放的道路。当时的一篇“广州观感”介绍说：“凡有空旷之地，聚众一、二百人，多数是宣传共产主义，痛言打破资本制度，一切军阀战争杀人流血，实由制度不良而

^①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② 《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

起。平民感受此种灌输，将来影响甚大。”^① 陈公博后来也回忆说：海员罢工“本来是国民党的联谊（义）社主持，迨（海员）来粤之后，共产党遂于中加紧活动。海员分子是当日共产党的唯一目标。”^② 1922年2月9日，中共广东支部散发题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提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四项原则，引导海员将罢工进行到最后胜利。同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时指出：广东党组织在海员罢工期间，“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布传单三千份”^③。由此可见马林所谓广东党组织与海员罢工无关的指责，是违反事实的。

四、中共广东支部无法领导1922年海员罢工的真由

中共广东党组织未能取代国民党而掌握香港海员罢工的领导权，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早年共产党人都以充当“后援”为己任，尚未意识到应当与国民党人争当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海员罢工后，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在上海发起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积极支持海员罢工。中共广东支部也在《敬告罢工海员》中声明：“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④ 这种甘当“后援”，尚未自觉与国民党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是与全党尚未成熟的认识水平相一致的。早年共产党人因其局限而未能在海员罢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① 《民国日报》1922年2月17日。

②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

③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④ 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

其次，当时中共广东支部陈公博等反对孙中山护法北伐，支持陈炯明叛乱割据，严重损害党在海员工人中的感召力。“二次护法”期间，国民党内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首的两大派系斗争甚烈。前者主张北伐统一中国，后者主张联省自治割据一隅。陈公博不顾党中央的劝戒，蒙骗广东党、团组织中的一些成员，诬指孙中山为“军阀”，妄称陈炯明为“革命”。这样，“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①。党中央及时处理这一严重事件，将陈公博等人开除出党，对参与此事的党、团员分别予以处分，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公开批判党内袒陈反孙的错误言论，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孙中山的民主斗争^②。

和陈公博等人的行径相反，香港海员和广州工人出于对孙中山的崇敬，不仅没有被陈炯明热心调停罢工的假象所迷惑，而且在陈炯明叛变之后，积极响应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号召，或举行罢工，或组织民军，或登舰作战，勇敢地捍卫孙中山的护法事业。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即派副官马湘“亲至海员联义社，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③。曾经领导香港海员罢工的苏兆征和林伟民，后来又成为组织民军讨伐陈炯明的负责人之一^④。只要将海员工人拥护孙中山的赤诚行动，与陈公博等人支持陈炯明的可耻表现两相对照，人们就不难理解中共广东支部在海员罢工及稍后一段时间里何以不能取代国民党而领导海员运动。同时，也不难理解苏兆征等后来加入共产党的海员工人何以在当年发出“找不到”共产党的感叹。

①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发展（提纲）》。

② 参见拙文《早期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护法运动的态度》，《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

③ 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

④ 邓泽如：《总理广州蒙难别录》。

五、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国共两党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这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历史条件，也向正在摸索苦斗的国民党人展现出足资借助的新的政治力量。五四期间，广州一些国民党人发动和联合当地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要求桂系军阀把持的军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让伍廷芳出任广东省长，罢免主席总裁岑春煊。这场旨在反对桂系军阀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是国民党“实际运用民众团体之始”^①。此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沈定一等人所办《星期评论》上，对维护劳工权益、引导劳工运动等问题，均有赞助性的探讨，其中不少看法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颇为接近。因此，当工人阶级觉醒之初，当国民党还以在野党身份与军阀作斗争的时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早年共产党人在发动、组织和支持工人运动方面，有过不分先后、不分彼此的精诚合作。国民党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得到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革命的先声。它说明日后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和工农民众的政策自有其长久积聚的历史渊源。

香港海员大罢工以促进国共两党第一次在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中协同行动，而开两党合作之先河；还以展示国共两党对待工人运动的真实态度，使海员工人思索和选择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领路人，而在国共两党各自的历史上分别竖立起意义不同的里程碑。虽然国民党史学家在回顾香港海员大罢工时，不无自豪地强调“本党实司指导地位”^①，但是他们却忌讳国民党在领导这场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组党”。但邹鲁将此事发生的时间说成“民国七年”，即1918年，误。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组党”。

罢工时所表现的动摇和妥协。这些动摇和妥协反映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早期劳工运动赞助、疏导和疑惧的矛盾心理。它们预示随着工人阶级日益觉醒及其与外国列强、封建势力乃至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日益激化，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将不愿也将不能领导日益成熟并富有反帝反封建政治内容的劳工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就成为国民党单独领导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震动全国的劳工运动。

香港海员罢工之际，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半年之久。党尚未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理论，刚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由于广东党组织在陈公博影响下一度袒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党在海员工人中的声誉受到损害。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早年共产党敏锐地觉察到海员罢工将对全国工人运动发生重大影响。他们不仅积极支持海员罢工，而且进而发动和团结全国的工人团体一同斗争。罢工结束后不久，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扩大了共产党在全国工人中的影响。参与此事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由此，中共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一位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此后三年又加入共产党的老同志则把香港海员罢工称为“中国海员工人运动的转折点”。他指出：“我们海员工人从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发展到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是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契机的。”^①这番话道出香港海员大罢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如果说五四运动锻炼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而准备了数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那么香港海员罢工也锻炼出一批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不满于国民党陈旧的主义和腐败的作风，决心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这就为日后党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① 冯燊：《中国海员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工运史研究资料》总33期。

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扶助劳工的国民党手上，最终转到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手中，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民主革命领导权转移的最初而又最基本的标志。从近代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一标志需要历经二七罢工、五卅运动才得以确立。可是，谁能因此忽视香港海员罢工的历史意义呢？